

“人”的出场与嬗变

REN DE CHUCHANG
YU SHANBIAN

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

周新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7.42/43

2008

REN DE CHUCHANG
YU SHANBIAN



“人”的常与嬗变

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

周新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周新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
ISBN 978 - 7 - 5004 - 6974 - 2

I. 人… II. 周…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5861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9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文学领域，“文学是人学”，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命题；唯其至高无上，所以就存在被架空的危险。放眼中外古今，你能说，哪一种文学不是人学？写花鸟虫鱼、山水田园的，不是人学？无须我来回答，20世纪60年代关于“山水诗和共鸣”问题的讨论，虽然重点在阶级性问题，但不管最终的结论如何、有无结论，山水诗终归是人写的，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所以也就离不开人。或者说，在当代中国，极“左”的政治化时期的文学，是“非人”的。殊不知，恰恰是那时候的政治，把“人的因素”，放到了“第一”的位置上，你说被这种政治“化”过了的文学，反而是“非人”的，似乎也说不过去。只不过，那时候的人，往往是鲁迅所说的“众数”，即群体意义上的或集合概念的人，而不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眼里的“个人”。凡此种种，既然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咸与“人学”了，说文学是人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这番话，并非在这儿抬杠，而是说，研究文学的人，不要满足于拿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到处去套，这样，要么搔不着痒处，要么说了等于白说。再说，与文学有关的人，如同现实中的人一样，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创作文学的人，即作家在变，被作家创造的人，即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包括思想感情，同样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在这些变化背后，还隐含着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作家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即关于人的观念的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变化。远的例子不举，就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先前认定人是分属不同阶级的，是有阶级性的，所以文学中所写的爱和恨之类的感情，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是阶级感情的一种表现。近三十年来，由于社会历史的变化，作家对人的认识和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这回不再死抠人的阶级性问题了，而是更多地关注超出阶级之上的人的自然属性或普遍人性。由于作家头脑中关于人的观念变化了，所以作为人学的文学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既可以看出文学的变化，也可以从文学中反身观照人自身的变化，对历史地“认识你自己”，是饶有意味的。

周新民的这部著作，就是研究最近三十年来，当代小说中“人的话语”（即人的观念及其表现）的变化的。这原本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颇得好评，后来又经过修改调整、增删打磨，显得更加完善。新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原本是学文艺学的，后来到我们下“被迫”转向现当代文学，就像当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虽然吃了一些苦头，但也颇见成效。所以他的这部著作，既带有他的出身成分决定的长于思辨的色彩，也带有接受改造后练就的经验实证的功夫。虽然新民还没有把二者结合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但这部著作的出版，毕竟预示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

於可训

2007年10月31日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目 录

序	於可训(1)
导 论	(1)
第一章 政治变革与“人”的话语建构	(9)
第一节 “人”的话语出场	(9)
第二节 “人”的边界	(17)
第二章 历史镜像	(25)
第一节 人性的回归	(27)
第二节 “理想”:历史意识的镜像	(39)
第三节 “知识”叙事	(53)
第三章 文化启迪与“人”的话语转型	(67)
第一节 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震荡	(67)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播	(78)
第三节 “人”:历史的解构	(89)

第四章 “个人”的浮出	(96)
第一节 个体意识的回归	(97)
第二节 “知识的暴力”叙事	(109)
第三节 指涉关联的断裂	(120)
第五章 生命的张扬	(134)
第一节 虚无的历史	(135)
第二节 生命意识的逃遁	(150)
第三节 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	(162)
第六章 神性的诉求	(173)
第一节 个体生存的承担	(176)
第二节 由革命走向神性	(187)
第三节 自然:人类的自我救赎	(202)
第七章 身体:“人”的延伸与转折	(220)
第一节 经济视阈下“人”的话语转型	(220)
第二节 性的本体化叙事	(232)
第三节 金钱与身体	(245)
第四节 身体: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256)
附 录	(268)
一 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 ——王安忆访谈录	(268)
二 写作,就是反模仿 ——叶兆言访谈录	(282)
三 打开人性的皱褶	

——苏童访谈录	(295)
四 由道德救赎走向神性救赎	
——刘醒龙访谈录	(316)
五 灵魂的守望与救赎	
——陈应松访谈录	(333)
主要参考文献	(356)
后 记	(372)

导 论

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中，最为根本的变化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心理活动、人的生命意识等等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在此前的一个历史阶段，主要以其负载的社会性内容的深广度和政治正确性为文学的评价尺度，而在这新的历史阶段，文学的评价尺度是“人”，是对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表现的深广度。

文学评价尺度的显著变化也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初，即有研究者对这一现象作出了准确、及时的描述。俞建章的《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对近三年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就是其中较早描述这一现象的文章。俞建章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观照“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价值、尊严等现象。随后许多文章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人道主义成为这期间文学研究的中心词。同时，也有研究者涉及与人道主义相关联的人性问题，如白桦的《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和张韧、杨志杰的《从〈啊，人……〉到〈人啊，人！〉——评近几年文学创作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就把人性和

人道主义连用，把人性看作是与人道主义一样的概念。稍后，刘再复的《论新时期文学主潮》（《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甚至用人性和人道主义来描述和概括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史。在稍后几年里，主体性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又一关键性概念，如李裴的《新时期小说表现的主体性问题》（《山花》1988年第10期）等。无论研究者使用人道主义还是人性抑或是主体性等关键词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用“人”这个概念来透视、研究文学对象。这一研究思路打破了长期以来单纯从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的狭窄视野，开辟了从“人”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新理路，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回归文学的人学本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后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一直沿袭这种思路，以至于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研究模式。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三十年时间里，文学中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理念。在“人”的空洞概念统摄下，各种“人”的观念，如生命意识、存在、神性、身体等，无法得到详尽而充分的理论阐释，同时，我们也无法解释，新时期文学中的“人”的理念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人”来透视、研究文学时，必须寻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我们寻找新的切入点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方法论启示。在福柯那里，人文学科中的“人”只是一个话语，它本身并不是真理性的判断。福柯所说的话语（discourse）指的是实践的语言，它不同于语言学中的言语和语言，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语言使用。同时，话语分析也不同于语言学上的词义、语法、句子、命题的性质，而是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性制度——发生联系。

在诸多话语中，“人”的话语是一种普遍性的话语，研究人

的话语，能有效揭示社会诸多方面的性质。如何研究人的话语，福柯给我们提供了极其有意义的方法论启迪。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种严肃的言语行为，这种行为产生的言语，福柯称之为“陈述”（statement），它是权威主体以某种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所说的话（包括写作、绘画等）。福柯把对话语进行分析的方法分为“谱系分析”（critical analysis）和“批判分析”（discursive series）两个部分。谱系分析研究的是话语系列的形成过程，各种话语特殊的规范、话语出现、发展、变化的条件。批判分析主要研究话语的排斥、性质和占有形式。

首先，我们看谱系分析的主要含义及在人的话语研究中的应用。

关于谱系分析，福柯这样定义：

这种研究不属于思想史或科学史，它的目的在于发现知识和理论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成为可能的，是在什么样的知识系统中被建构的，究竟在什么样的历史先在假设条件下思想才会出现，科学才会确立，经验才被反映进哲学，理性才会形成，而这一切（随着新的历史先在假设的出现），以后又会瓦解和消失。^①

在福柯的谱系分析方法中，话语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它有起源，有发展与变化的可能，而且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话语可能会消失。在进行谱系分析时，要寻找那些制约话语产生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被大多数人所忽视。但是福柯认为，在这些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p. 28 - 29.

为人们所忽视的事件、现象上，往往具有改变历史走向的功能。例如，福柯在探讨生产驯服且训练有素的肉体的“正确训练”的新手段时发现，在当时，出现了一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这些现象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福柯却认为，在这些琐碎的技术背后，却蕴藏着人文学科崛起的新征兆。

用谱系分析的方法考察人文学科的诞生与演变时，福柯提出了“知识共因”这个概念：

所谓知识共因……就是一种总关系。在特定的时期中，那些引起认识修辞、科学和可能的形式系统，就是由这一总关系联结在一起的。……知识共因不是一种知识形式，也不是一种贯穿于各不相同的科学之间，显示出议题、精神或者时代崇高统一性的所谓理念。它是当我们在话语规律层次上分析科学时，在那些属于某一时期的可以发现的关系的总和。^①

福柯之所以提出知识共因这个概念，是因为知识共因是引起“人”诞生的决定性因素。他曾经从西方思想中抽取出三个时期来标志和描述由知识共因所构成的系统。这三个时期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三个时期的知识共因与“人”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共因是“相似”（resemblance），人是和神相对应的；古典时期的知识共因是“代表”（representation），人只是自然意义上的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91.

人，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人（它才是人文科学的可能对象）。福柯认为，到了现代时期，由于知识共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才成为人文科学的对象。

结合中国三十年来文学中的实际情况，借助福柯的谱系分析，本文在研究三十年来小说中“人”的话语时，注意到这一阶段的“人”的话语内部并不存在一个连续体。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人的话语，无论是观念还是表现形式，都存在着断裂。福柯面对西方的“人”的话语起源与流变过程，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人的话语流变中，存在着影响人的话语断裂的因素是难免的。而本书中所研究的人的话语，只是涵括了三十年来历程，在这样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提出“人”的话语的断裂性，似乎有些牵强。但是这三十年，时间虽短，对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说，却并不短暂。在这三十年里，影响中国人心态的不仅有政治原因，还有文化因素，当然也包含经济的作用。这些在短短三十余年里发生的引起中国人心态变化的社会生活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并以审美的方式投射出来。因此，我认为，近三十年来的小说中“人”的话语并不是一个连续体，它出场之后，并不以一个连续不断的面目持续存在，在不同的阶段，它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与特征。我认为，在近三十年里，有三种因素对这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的覆没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政治性事件直接决定了“人”的话语的出场；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掀起了文化热，这一文化潮流直接改变了70年代末出场的“人”的话语形态；最后，在9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又使人的话语发生了一次新的嬗变。正是在不同的时期影响“人”的话语的因素变化，决定了各个时期“人”的话语的内容及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因此，

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期，影响“人”的话语的因素是什么，探讨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人”的话语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态。

福柯在研究人文学科的话语时还利用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法——批判分析的方法。批判分析的方法旨在通过考察话语主体的话语生成过程，来分析话语同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思想之间的关系，揭示话语的实质。在这里，福柯悬置起话语本身的真理性，而侧重于话语实践产生的条件。在福柯看来，话语的产生受到一系列排斥、控制，这些排斥、控制形式，可分为话语外在控制过程、内在控制过程和应用控制过程。福柯认为，揭示话语的控制过程，有助于了解人文学科同外在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的关系。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福柯的话语理论及福柯分析人文学科话语的方法，有必要了解他的话语控制过程理论。

首先来看他对话语外在控制过程的论述。话语外在控制过程是指社会性的禁止和排斥过程，这种禁止和排斥过程在福柯看来主要有三个方式：言论禁止、歧视疯狂和真理意志。真理意志是指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真理。在话语形成过程中，它具有重要作用。而话语内在控制是话语对自身的限制和规定。这是一种话语使自己的意义局限化的过程，它分为三种情况，分别为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评论原则是指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某些主要的叙述话语，它被其他的叙述话语重述、重复或变换。福柯认为，作者不是指写作文本的说话者和个人，而是一种组织话语的原则。它代表着话语意义的来源，代表着文本话语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学科原则是指话语要受到学科范围内的关于真理与伪真理的陈述的制约。话语应用原则是指应用话语的先决条件，这是一种对话语主体的控制过程，它显示了话语领域对话语主体开放的原则。对话语主体的控制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言语程

式、话语社团、思想原则和社会占有。

福柯关于“人”的话语同社会文化制度的联系以及话语的外在控制过程的论述对本书的研究有较大的启发。讨论近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时，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话语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人”的话语的产生、流变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理念对人的观念的认同和许可息息相关。本书认为，1976年以来，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从总体上是对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乃至以后的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主流的“人”的观念的反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中国主流话语中的“人”的话语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被动载体，“人”失去了应有的个性及个体的生命体验。这种“人”的话语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为摆脱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压力及现代化焦虑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它表现出对西方观念中人的理念的排斥。而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产生新的素质提供了政治保障。三十年来小说中人的话语对此前中国主流话语中的“人”的话语的反拨，实质上也就消解了先前对历史、现实进行想象的历史意识。

研究1976年以来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阶段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产生的思想背景，主要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的“人”的思想，这同时也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观念中的人的思想的默许。这种政治、文化禁忌的解除是三十年来小说中人的话语出场和嬗变的外部原因。政治、文化禁忌的解除为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的思想观念——在福柯那里是真理意志——的提出和建构提供了保障。在“人”的话语出场阶段，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的引进，90年代对市场经济

的倡导，逐步为“人”的话语发展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使“人”的话语能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人”的话语流变过程中，背后隐藏的是深层的历史意识的张扬与沉潜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的变迁史又是历史意识的沉浮史。

本书所描述的人的话语变迁轨迹包含了历史意识由显至隐到逝的过程。在“人”的话语变迁的第一个阶段，“人”的话语体现为鲜明的历史意识，“人”的内涵由历史意识所决定，对现代化的向往和追寻的历史冲动，铸就了“人”的话语的全部内容，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实质上是历史的镜像。在“人”的话语变迁的第二个阶段，历史意识由显层退隐到潜层，它是作为人的话语张扬的对象的另外一极——消解对象——而出现的。在这一阶段，“人”的话语全面消解了历史意识的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价值标准。但是，历史意识仍是隐性的存在者。它是这一时期的“人”的话语得以存在的一端。在“人”的话语变迁的第三个阶段，历史意识已经从“人”的话语中全面退却，连在前一时期中被消解、对立的位置和功能也丧失了，它被纯粹的私人性、个体性的生存体验所取代。

综上所述，本书在福柯的人文学科话语研究方法的启示下，重点研究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在各个不同时期产生的原因、表现形态和逻辑层次。这种研究力图在史的方面，展示“人”的话语的丰富的历史面貌及动态过程；在逻辑层面上，力图显示“人”的话语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从“人”的话语的内在历史与逻辑的联系中，表现出它与外在的社会文化制度的关联。

第一章

政治变革与“人”的话语建构

第一节 “人”的话语出场

人道主义思想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往往被归类为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1957年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后，更形成了一个批判人道主义思想的高峰。钱谷融出于“一般人往往把描写人仅仅看做是文学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的考虑，提出了文学的目：“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在他看来：“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①钱谷融显然将“人”放在了文学的中心。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把人作为文学的中心”的

①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